

杜甫詩論集

金启华 著

杜甫詩論集

1207.22/20

1207.22/20

社会科学战线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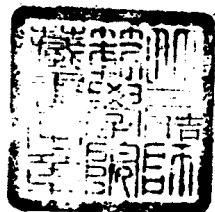
杜甫詩論集

金 启 华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35452



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735452

社会科学战线丛书

杜甫诗论集

金启华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5 $\frac{3}{4}$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书号：10091·708 定价：0.46元



目 录

论杜甫诗歌的政治意义·····	(1)
杜诗中所反映的战争问题·····	(11)
论杜甫的思想·····	(18)
杜诗风格论·····	(31)
杜诗渊源论·····	(46)
杜诗影响论·····	(66)
杜诗技巧论·····	(91)
杜甫的诗论·····	(118)
论杜甫的绝句诗·····	(132)
杜甫的艺术修养·····	(145)
杜甫家世考·····	(164)
杜甫的病和死·····	(171)

D C 30 / 29

论杜甫诗歌的政治意义

杜甫的诗歌，就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生活方面来看，是极为广阔和多样的。而现实里最活跃的部分——政治，更是他所特别关心的。所以宋祁就说过他是“善陈时事”（《新唐书·杜甫传赞》）。这里的“善陈时事”，当系指他关心政治，以及在政治影响下的众多事件，而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诗歌里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义。而关心政治事件，又必然要参与政治实践中去。杜甫的希望参与政治，是从他三十五岁（天宝六载）自齐、赵间放荡归来，到了长安，在第二年曾参加玄宗的特科考试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十五《唐纪》三十一称：“上欲广求天下之士，命通一艺以上，皆诣京师。”不过由于当时宰相李林甫的欺上压下，并没有一个人中选。这在同书同卷又这样记载着：“李林甫恐草野之士，对策斥言其奸恶，建言举人多卑贱愚瞶，恐有俚言污浊圣听，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，灼然超绝者，具名送省，委尚书复试，御史中丞监之，取名实相副者闻奏。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，遂无一人及第者。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”。这样，杜甫也就失去了进身的机会，在长安困顿下来，过着所谓“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。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的生活。他尽管贫穷，然而胸怀大志。他的政治理想，是

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（同上诗）所以他在应试失败后，又献诗大臣，如韦济、张垪等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提携，是：“窃效贡公喜，难甘原宪贫”。（《奉赠韦左丞丈》）是：“悦忆山阳会，悲歌在一听。”（《赠翰林张四学士垪》）又在天宝十载那年，献上《三大礼赋》，这次引起了玄宗的注意，惊异他的才华，命他待制集贤院。第二年“召试文章，送隶有司，参列选序。”（钱谦益：《少陵先生年谱》）适值李林甫死，杨国忠执政。杜甫这才吐出心头郁闷，道出他是：“破胆遭前政，阴谋独秉钧。微生沾忌刻，万事益酸辛。”（《奉赠鲜于京兆》）然而杜甫的遭遇，依旧是所谓“进无补于明时，退尝困于衣食。”（《进封西岳赋表》）于是他又献上《封西岳赋》《雕赋》，又上诗给大臣，如鲜于仲通、韦见素等，所谓：“途远欲何向？天高难重陈。……有儒愁饿死，早晚报平津。”（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）所谓：“才杰俱登用，愚蒙但隐沦。……巫咸不可问，邹鲁莫容身。”（《上韦左相二十韵》）又赠诗武将，如田梁丘、哥舒翰等，所谓：“陈留阮瑀谁争长，京兆田郎早见招。麾下赖君才并美，独能无意倾渔樵。”（《赠田九判官梁丘》）所谓：“壮节初题柱，生涯独转蓬。……防身一长剑，将欲倚崆峒。”（《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》）可是杜甫并没有被这些人所注意，他是叹息着：“君不见才士汲引难，恐惧弃捐忍羁旅。”（《白丝行》）而在天宝十四载，才得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。接着，他到奉先县接受他的家小，也抒发了他这一阶段的心情，他自称：“许身一何愚？窃比稷与契。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比那

个“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犹己饥之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比那个“契为司徒而民辑”（《国语·鲁语上》卷四）可是这种自况，所遭遇的反响是什么呢？他也自知是：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。取笑同学翁，浩歌弥激烈。非无江海志，潇洒送日月。生逢尧舜君，不忍便永诀。当今廊庙具，构厦岂云缺？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莫夺。”（同上诗）这里，侨辈的讥讽，自己的矛盾，杜甫都能不睬理，不灰心，只是关心民瘼，希望君如尧舜。这是具有较崇高的政治理想哪！可是当时政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？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天宝以来，他是“边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开边意未已。”（《兵车行》）的穷兵黩武者，他是“就中云幕椒房亲，赐名大国虢与秦”（《丽人行》）的荒淫昏聩者。一方面开边，发动侵略战争，造成人民死亡和骨肉离散；一方面腐化享乐，加深对人民的剥削。而当时宰臣杨国忠的骄奢淫乐和贵妃姊妹的宴游，是所谓：“炙手可热势绝伦，慎莫近前丞相嗔。”（《丽人行》）边将安禄山的野心勃勃，恃宠而骄，是所谓：“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。边人不敢议，议者死路衢。”（《后出塞》五首之四）杜甫在长安的十年中，看到了这些现象，并把他们反映在自己的诗篇里。而在他从长安赴奉先的途中，经过骊山，他更看到统治集团的人物，是：“君臣留欢娱，乐动殷轸。赐浴皆长纓，与宴非短褐。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而“彤庭所分帛，本自寒女出。鞭挞其夫家，聚敛贡城阙。”统治者尽情享乐，人民极端痛苦。杜甫尖锐地道出这里的阶级矛盾是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（同上诗）这就是安

史之乱前夕的唐代社会的真实情况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杜甫希望君如尧舜的幻想破灭了。接着发生了安史之乱，以及后来的吐蕃入侵和蜀中、湖南的战乱。长期以来，杜甫都身经这些灾祸，更进一步地看到人民的疾苦。而在这些战祸中，统治者更加深对人民的剥削、掠夺，政治上愈加黑暗、残酷，杜甫是把这些情况，在他的作品中继续地、深刻地反映出来。后来的现实情况，是：“伤时苦军乏，一物官尽取。嗟尔江汉人，生成复何有？”（《枯橈》）人民就这样遭遇到如此残酷的剥削。他更叹息地道出：“乱世诛求急，黎民糠粃窄。饱食亦何心？荒哉膏粱客。富家厨肉臭，战地骸骨白。”（《驱竖子摘苍耳》）“盗贼浮生困，诛求异俗贫。空村惟见鸟，落日未逢人。”（《东屯北崦》）人民在官吏如此豪夺下，不但饥饿、贫困，而且卖儿鬻女来偿付租税，这里杜甫又写出这种情况，所谓：“去年米贵缺军食，今年米贱大伤农。高马达官厌酒肉，此辈杼柚茅茨空。……况闻处处鬻男女，割慈忍爱还租庸。……万国城头吹画角，此曲哀怨何时终？”（《岁晏行》）而且十室九亡，寡妇少女也在所难逃。我们看他又写出：“戎马不如归马逸，千家今有百家存。哀哀寡妇诛求急，恸哭秋原何处村？”（《白帝》）由于“征戍诛求寡妇哭”，我们的诗人是“远客中宵泪沾臆。”（《虎牙行》）至于少妇的情况，杜甫又描绘她们，是：“石间采蕨女，鬻市输官曹。丈夫死百役，暮返空村号。闻见事略同，刻剥及锥刀。贵人岂不仁，视汝如莠蒿。索钱多门户，丧乱纷嗷嗷。奈何黠吏徒，渔夺成逋逃。”（《遣遇》）老女的遭遇，则是：“夔州处女发半华，四十

五十无夫家。更遭丧乱嫁不售，一生抱恨长咨嗟。”（《负薪行》）男女的命运，是“大麦干苦小麦黄，妇人行泣夫走藏。”（《大麦行》）而当时总的情况，杜甫更概括出是：

“萧条四海内，人少豺虎多。少人慎莫投，多虎信所过。饥有易子食，兽独畏虞罗。”（《别唐十五 诚因寄礼部贾侍郎》）所谓杜诗为史，应该是从这些方面来认识的。作者对这些阶级矛盾阶级剥削情况，更是倾向于人民，为人民发出不平之鸣。同时我们知道这些灾祸的产生，更和战争是紧密关联的。而安史之乱是个发端，这样，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，自然可以减少人民的疾苦。因此，杜甫在安禄山势力正猖獗的时候，他却大节不污，不屈服于异族，冒死从沦陷的长安投奔行在，参加抗战政府，这种行为本身就表现他爱祖国、爱人民的精神。而在凤翔担任左拾遗任上，更积极地行动，尽忠职守。他推荐人才，如上《为补遗荐岑参状》，使“识度清远”的岑参能够更为朝用。他疏救宰臣房琯，认为“罪细不宜免大臣”。这都表现他公忠谋国的优良政治品质。而后一件事，更是和杜甫后来的荣辱、进退，有着密切联系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杜甫并没有缘于“与房琯为布衣交”而得官，但却因为救房琯而得罪肃宗，而终于贬放。这里是暗藏着皇室内父子间的明争暗夺，而房琯和杜甫都是站在公忠正直这方面的。本来，房琯的得到玄宗赏识，是玄宗在西奔成都途中，房琯随后跟至，“上与语甚悦”，即日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房琯并为玄宗策划“分道制置”的办法，命太子并诸王分领重地，形成大包围局势，来应付安禄山的。安禄山当时听到这策划，也叹息道：“吾不得天下

矣！”这样对敌人不利，对唐王朝却是有利的。可是当时的太子——李亨，为着急于称帝，事先并未得到玄宗诏令，就在灵武即位，迫使玄宗不得不行内禅，并命令宰臣房琯来奉册追认。房琯是以玄宗旧相又来相肃宗的。这里，玄宗、肃宗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已使得臣下颇有为难，何况房琯又是策划“分道制置”的人，使诸王又威胁着肃宗的帝座呢？这就决定房琯是不可能久留其位的。于是不久借陈陶之败和门客琴师董庭兰的纳贿的缘故，而罢了房琯。至于贺兰进明的谗言，对肃宗来说，可谓“正中孤意”。不过当时负时望的，又莫如房琯、张镐，罢房琯而相张镐，也算照顾一下物议，可是张镐的为相不到数月，又奉令出巡，并不能安于其位。这样上皇旧臣都不容于新君，而都是贤能之士。杜甫在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，却站在正直的一方面，为着疏救房琯，险遭不测之祸，幸而为张镐所救，认为“甫若抵罪，绝言者路。”这才免于刑狱，但为肃宗墨制放还鄜州省家，变相地贬斥了他。然而杜甫却：“虽乏谏诤姿，恐君有遗失。”（《北征》）虽然不容于朝，但对自己私事，是：“柴门虽得去，未忍即开口。”（《述怀》）这样公而忘私。直到他还京以后，在谏省时，对拾遗这个职务，仍然常常自勉，所谓：“衰职曾无一字补，许身愧比双南金。”（《题省中壁》）而勤于职守，是：“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？”（《春宿左省》）这都想尽言官的责任，对国家、对人民能有所贡献，然而这些希望不久就被灭了。随着房琯的贬官，杜甫也跟着外放。之后，又弃官流浪，飘泊西南。可是我们知道尽管杜甫离开朝廷，但并没有忘情现实，脱离政治，忘

掉人民，反而和人民更接近了，而来为人民呼吁。同时那些争权夺利的战争，仍然没有停止，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，更是有增无已。于是我们的诗人更道出：“故乡门巷荆棘底，中原君臣豺虎边。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。”

（《昼梦》）“战伐乾坤破，疮痍府库贫。众寮宜洁白，万役但平均。”（《送陵州路使君之任》）“山东残逆气，吴楚守王度。谁能叩君门？下令减征赋。”（《宿花石戍》）另外，我们知道由于战祸、天灾，也使得杜甫过着凄苦、流浪的生活，和人民一道在受难。可是在这些苦难的遭遇中，他是希望别人不再碰到这些不幸。所以他自己茅屋为秋风所破时，屋漏雨打，居无定处，他却希望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呜呼，几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（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）后来见到别人流浪，他亦道出：“几时高议排金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。”（《寄柏学士林居》）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，在当时的现实面前，都成泡影。杜甫所看到的、所接触的，倒是那饥饿贫苦的人民，更包括那无依无靠的寡妇。诗人面对这些情况，尽管他不在其位，不能兼济，然而当他碰到那些贫苦的人民，他无不尽最大的努力，去接济他们。譬如他在夔府村居时期，自己督促耕种，在秋收季节，他是“遗穗及众多，我仓戒滋蔓。”（《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》）而自谦并不是为着图名，所谓“西成聚必散，不独陵我仓。岂要仁里誉，感此乱世忙。”（《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……》）至于自己的果树、果实，也是让人敲打，所谓：“枣熟任人打，葵荒欲自锄。”（《秋野》五首之一）所谓：“堂前扑

枣任西邻，无食无儿一妇人。不为困穷宁有此，只缘恐惧转须亲。即妨远客虽多事，便插疏篱却认真。已诉征求贫到骨，正思戎马泪盈巾。”（《又呈吴郎》）这里，对贫苦妇女，更是同情，而又能为她着想，并推究贫困原因。更难得的是杜甫在湖南漂泊之际，也能“减米散同舟，路难思共济。”

（《解忧》）他就是怀着这样济世救人的心肠，来对待他所接触的人民。可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，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又如何呢？唐玄宗是由于晚年的荒淫、昏聩，而造成了安史之乱。在肃宗当国时候，本来是在忧患中即位，应当有所作为，但是他仍然不能清醒耳目，起初是听用了宦官邢延恩的话，催促房琯出师，致有陈陶之败，后又在张良娣、李辅国的娇惯、挟持下，致使父子恩疏，贤臣远放。杜甫是有《洗兵马》诗，来讽刺肃宗，正如钱笺所云：“刺其不能尽子道，且不能信父之贤臣，以致太平也。”而代宗朝，又是程元振用事，解郭子仪兵权，以致吐蕃入寇，京都沦陷，杜甫是有《忆昔》之一，来讽刺代宗的，又如钱笺所谓：“此不亦童昏之甚乎？公不敢斥言，而以忆昔为词，其旨意婉而切矣！”而对程元振的贻误国事，仅削职放归，所谓：“但恐诛求不改辙，闻道嬖孽能全生。”（《释闷》）是深表不满的。从上所述，我们可以明察唐代从天宝以来，政治是如此混浊，杜甫的希望都成泡影，他不得不叹息地概括当时的政治情况，是：“惜哉俗态好蒙蔽，亦如小臣媚至尊。政化错违失大体，坐看倾危受厚恩。”（《石笋行》）然而他仍然希望改变这种情况，并希望自己来清醒天子耳目。他是：“尚思趋朝庭，毫发裨社稷。”（《客堂》）他是：“勋业

频看镜，行藏独倚楼。时危报明主，衰谢不能休。”（《江上》）他是：“在家常早起，忧国愿年丰。语及君臣际，经书满腹中。”（《吾宗》）他希望：“冯唐虽晚达，终冀在皇都。（《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，正月月中旬定出三峡》）同时更希望他的一些登用友朋，是：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（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，率尔遣兴，寄递呈苏涣侍御》）而对严武，更希望他“公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”（《奉送严公入朝十韵》）也希望友朋，“上请减兵甲，下请安井田。”（《湘江饯宴裴二端公赴道州》）更盼望具体的政治情况，是：“致君唐虞际，淳朴忆大庭；何时降玺书，用尔为丹青。狱讼永衰息，岂惟偃甲兵，凄惻念诛求，薄敛近休明。（《同元使君春陵行》）杜甫又是这样希望有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，有比较清明的政治，来减少人民的疾苦，更希望停止那割据的战争，人民都过着愉快的劳动生活。所谓：“天下郡国向万城，无有一城无甲兵，焉得铸甲作农器，一寸荒田半得耕。牛尽耕，蚕亦成，不劳烈士泪滂沱，男谷女丝行复歌。（《蚕谷行》）可是这种生活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，尤其是在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不可能达到的。所以杜甫到老来漂泊湖南之际，他沉痛地道出：“春岸桃花水，云帆枫树林。偷生长避地，适远更沾襟。老病南征日，君恩北望心。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。”（《南征》）杜甫就这样以诗人结束他的一生。千载之后，我们知道诗人用心之苦，诗人是有政治抱负的，是参预政治的，他的诗更富于政治意义，是揭露了当时封建政治的黑暗罪恶，是表达了进步的政治理想，尽管有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，

但应该说：他的诗是他所生活着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镜子，他的诗，表现了重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，充满了同情当时人民生活疾苦的感情。他是个“政治诗人”。他的诗是政治诗。

杜诗中所反映的战争问题

杜甫是一个极关心政治的诗人，他对于当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争问题，当然更特别重视。而对战争性质的不同，他亦能表示出不同的态度。我们现在看杜甫的诗歌——他的有关于战争的诗歌，可以说是以安史之乱的前后为分界。安史之乱以前，他是反对唐王朝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。所谓：“君已富土境，开边一何多？”（《前出塞九首》之一）所谓：“边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开边意未已。”（《兵车行》）他之所以反对侵略战争，就是想人民免得遭受战祸，造成家庭离散、骨肉永别的痛苦，是基于同情人民这方面的。可是当国家遭遇到敌人的进攻，国土沦陷，京都被占领，人民遭受残杀时，就只有以卫国战争来制止它，狠狠地打击敌人，并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。这在他的诗歌里都有所反映。现在分别来加以论述。

杜甫亲身所遭遇的战争，以安史之乱为最剧烈而且也比较长期。这造成了“华夷相混合，宇宙一羶腥”（《秦州见敕目……》）的局面，出现了“万人尚流冗，举目惟蒿莱。至今大河北，化作虎与豺”（《夏日叹》）的惨状。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就当然只有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；而更重要的是要操持胜算，要有制胜的战略思想和行动。现在从安史之乱的开始谈起。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持宠骄纵，在他未反以前，固

然有张九龄认识他的“反相”，而杜甫对他的飞扬跋扈和玄宗的放任不问，在他诗里都有所指责，认为安禄山是“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。”然而“边人不敢议，议者死路衢。”

（《后出塞五首》之四）这是和禄山背叛之前的历史记载相符合的，可见他有先见之明。

安禄山反后，从范阳长驱南下，海内震荡，玄宗西奔四川，两京陷落。杜甫曾身陷长安，目睹敌人气焰嚣张，唐王朝举国惶惶，但是他对于国家复兴之望仍是具有信心的。同时对敌我军情均有所了解，并表示出他对战略方面正确的看法。我们知道唐玄宗在西奔的道上，曾因爱国人民的要求，留下了太子——肃宗，命他往西北收抚众军，藉助外力来抵御敌人，曾“令力士口宣曰：汝好去，百姓属望，慎勿违之，莫以吾为意。且西戎北狄，吾尝厚之。今国步艰难，必得其用，汝其勉之。”（《旧唐书》卷十《肃宗纪》）这样唐肃宗才到灵武抚军，并借兵回纥助战。我们看杜甫在长安的《哀王孙》诗，就道出：

窃闻天子已传位，圣德北服南单于。花门剺面请雪耻，慎勿出口他人狙。

这多么的洞察时事，和玄宗上面的话暗相吻合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唐王朝的能够战胜安史，主要的是依赖于人民的热爱祖国，和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领的善于用兵，不过支持唐王朝的少数民族——回纥的助战，在当时的多次战役中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杜甫是能看出这一点的。至于安史之乱中的几个重大战役，如潼关之役、陈陶斜之役、相州之役，杜甫都曾有诗反映，并表现出他对战

略方面正确的看法。譬如潼关之战，主帅哥舒翰是主张采取以逸待劳的守势的。郭、李诸将也是主张北取范阳，覆其巢穴，而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毙之。这在当时贼势正盛的情况下，是完全应当的。只由于杨国忠的一再促战，才以致于全军覆没。杜甫的《潼关吏》诗，曾道及潼关之险要，并主张坚守。他写道：

连云列战格，飞鸟不能逾。胡来但自守，岂复忧西都？丈人视要处，窄狭容单车。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。哀哉桃林战，百万化为鱼。请嘱防关将，慎勿学哥舒。

尽管这首诗是作在收京以后、相州败时，但是潼关形势的利于坚守，杜甫是看到的。

陈陶斜之役，是安禄山叛军占领长安后，唐肃宗命令房琯反攻，打的一个败仗。这次失败的原因，是面临着强大的敌人，而唐王朝急于求胜，以相为将，而又以宦官监军、促战，不顾时机，因而败绩。杜甫的《悲陈陶》诗云：

孟冬十郡良家子，血作陈陶泽中水。野旷天清无战声，四万义军同日死。群胡归来血洗箭，仍唱胡歌饮都市。都人回面向北啼，日夜更望官军至。

这诗里，反映了“胡”兵的骄纵凶残，以及人民的盼望官军，表现了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，而且这也正是唐王朝所以能平定祸乱的主要原因。然而贼势正盛，反攻有待时机，杜甫也首先道出：

焉得附书与我军，忍待明年莫仓卒（《悲青坂》）。

这是杜甫由于身陷长安，对于敌情民心知道得深切，所以才写下这样诗句。而这诗里的所谓明年，正是至德二载，